

东北亚地区碎片化的 形成与治理^{*}

——基于分析折中主义的考察

李开盛

【内容提要】 东北亚地区碎片化主要体现为不同国家或国家合作区块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理解其成因,旨在超越单一范式、揭示复杂现实的分析折中主义是最为适宜的分析路径。根据这一路径,作者从利益与观念两方面剖析了碎片化的表现,从权力、安全和经济合作等利益因素以及传统文化、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等观念因素梳理了碎片化形成的根源。作者认为,区分利益还是观念何者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十分困难,也无必要。关键是要看到,两方面因素相互交织,使得东北亚的碎片化呈现出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局面。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东北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已经落后,应该及早有效地缓解并最终消除这种不正常的碎片化状况。根本办法在于以强调实用主义的分析折中主义为指导,加快推进整体性治理进程,最终以地区层次的合作包容彼此竞争的各国家或国家合作区块,实现东北亚整合与一体化。

【关键词】 东北亚;碎片化;分析折中主义;区域一体化;区域治理

【作者简介】 李开盛,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上海 邮编:200020)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4)04-0021-18

^{*} 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刘鸣研究员主持的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新变化与我国的综合方略研究》(课题编号:13&ZD050)的阶段性成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朱杰进博士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一 基本概念与分析框架

地区层次的合作缺失一直是东北亚的软肋,特别是与其他地区相比较,“东北亚经济和安全合作缺乏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层次的正式制度化”。^①但与此同时,该地区存在各种各样的双边甚至多边的次地区合作,地区合作的缺失与次地区合作顽强发展并存的局面成为东北亚的突出现象。针对前者,不少学者致力于为未来的东北亚设计一种地区合作特别是安全合作框架;^②而在后一层面,有关次地区合作的研究(例如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中韩关系、中朝关系等方面的成果)亦汗牛充栋。但较少有人注意到,正是这种次地区层面的合作与整个地区层次的合作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也就是说,各种次地区合作构成了一块块“国家合作区块”,但这些“区块”之间却存在着竞争甚至冲突关系,从而导致整个地区层面的合作难以进行。比如说,对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中韩持激烈反对的态度,而美国则出于自己的战略需要持基本支持的立场。^③当然,也有不少竞争或冲突关系存在于单个国家之间,例如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结果是,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版图由彼此竞争甚至冲突的国家合作区块或国家所组成,出现一种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局面。

所谓碎片化,原意为完整的東西分裂成碎片或碎块,也可以引申为一个机体内部的各要素或各部分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和统一性。该词自20世纪80年代末常见于后现代主义研究文献之中后,已在各个学科领域得到广泛的引申使用。政治学领域常用这个词来表示主权国家分裂,如乌克兰在种族、语言、宗教和社会经济上所形成的永久的区域性裂痕。^④在国际法领域,则有人用它来形容现代国际法体系,因为后者“充满了具有不同程度的法律一体化的普遍性的、区域性的或甚至是双边性的体系、小体系和小小体系。存在于这个体系内部的各种规范和制度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结构上的有机联系,它们相互冲突、彼此矛盾,就像堆积在一起的‘玻璃碎片’”。^⑤还有人用它来形容美国地方政府“由于政府职权的划分和政府管辖权限与边界的增殖而产生的

① Vinod K. Aggarwal and Min Gyo Koo, “An Institutional Path: Community Building in Northeast Asia,”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Chung-in Moon,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east Asia: Debates, Issues, and New Order*,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8, p. 286.

② 相关的研究可参见张春:《设计未来:东北亚安全机制的路线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③ 《美国称日本有权行使集体自卫权 但需向韩国解释》,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3-11/21/c_125736634.htm, 登录时间:2014年3月12日。

④ 黄升民、杨雪睿:《碎片化:品牌传播与大众传媒新趋势》,载《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第6页。

⑤ 古祖雪:《现代国际法的多样化、碎片化与有序化》,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9页。

复杂状况”,这些地方政府不仅在数量特征上表现为大量的碎片,而且在地域和功能上彼此交叉重叠。^①学者们也开始用“碎片化”一词来描述国际政治特定领域协调公私规范、条约和组织时不断出现的多样性与挑战,或是在同一问题上出现若干平行条约、不同成员分别参与其中这样一种情形。^②

在东北亚,这种碎片化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况。这是因为,尽管一些国家可能在某一议题上分别属于不同的国家合作区块,彼此间是竞争甚至敌对关系,但在另一议题上它们可能又是合作甚至盟友关系,相互结成新的国家合作区块去对抗在原来议题上的盟友。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双重或多重碎片化”,它不但使得这个地区的不同国家组合间常处于竞争、对立关系,而且又通过双重或多重碎片化模糊了这种竞争和对立的边界,使得不同的国家合作区块之间形成一种交叉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大大加剧了地区形势的复杂性与解决的难度。目前,合作的碎片化已对东北亚各国的根本利益以及地区整体利益均造成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碎片化所带来的张力抵消了许多合作区块的效果,使得许多领域的合作难以进行。例如,尽管东北亚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紧密,但历史、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阻碍这一地区的国家结成正式的经济集团。^③第二,更加重要的是,合作碎片化中所存在的张力使得地区的整体合作被分割和撕裂,地区一体化因此变得遥遥无期。特别是与那些正在一体化道路上大步探索的其他地区相比,人们有理由担忧:即使东北亚经济现在欣欣向荣,如果不及早缓解并消除碎片化,其未来发展迟早会受到地区合作滞后的损害。

可见,东北亚要保持持久的繁荣,管控紧张与冲突,就必须缓解并最终消除国家或国家合作区块之间的冲突关系,从碎片化走向有序化和一体化。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全面、深入地了解东北亚碎片化的现状与成因,进而找到碎片化治理的切入点与正确路径。对此,仅仅运用某种单一的范式很可能是不够的。东北亚碎片化是该地区不同国家行为互动的结果,要解释碎片化的形成,就必须解释相关国家的行为。从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来看,解释国家行为的范式主要是两个:一是强调利益的理

① 罗思东:《美国地方政府体制的“碎片化”评析》,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4期,第106页。

② Fariborz Zelli and Harro van Asselt, “The Institutional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sponse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3, No. 3, 2013, pp. 1-3; Andries F. Hof, Michel G. J. den Elzen and Detlef P. van Vuuren, “Environmental Effectiveness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Fragmented versus Universal Regime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Model Studie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Vol. 9, No. 1, 2009, p. 39. 转引自王明国:《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与机制融合的前景》,载《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5期,第17页。

③ Sarah Chan and Chun-Chien Kuo, “Trilateral Trade Relations among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ast Asia*, Vol. 22, No. 1, 2005, p. 34.

性主义,二是强调观念的建构主义。在理性主义者眼中,国家都是理性行为体,利益是国家行为的根本驱动力。而建构主义认为,利益是由观念建构的,至少是要通过观念才能起作用,所以身份与认知在决定国家行为过程中起根本作用。^①单一因素的解释模式对于简化现实、提炼理论是有帮助的,但要解释东北亚碎片化这一复杂的事实,单一范式就显得力不从心。例如,利益因素能够解释钓鱼岛争端,但无法解释历史问题在中日、中韩关系中的突出地位。日本右翼人士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以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伤害的不是中国的具体利益,而是中国人民的尊严与感情,但结果是中日关系由此受到了空前严重的损害。这表明,单一因素解释常常存在局限,我们有必要以一种综合的分析框架来探讨东北亚地区碎片化的问题。国际关系研究中新兴的一种研究路径——分析折中主义(analytic eclecticism)就是这样一种工具。

折中主义本是一种致力于从不同的理论、方法与风格中选取最佳要素加以组合的哲学传统、工作方法与思维方式。在国际关系领域,提出分析折中主义的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鲁德拉·希尔(Rudra Sil)和康奈尔大学的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希尔于2000年7月在《理论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折中主义的基础:能动性、文化和结构在社会理论中的认识论地位》一文,开始涉足折中主义。^②卡赞斯坦则于2001年年底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日本与亚太安全:分析折中主义的案例分析》,开始将折中主义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③该研究方式的正式确定是在2003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此后两人又共同发表了系列论文,特别是于2010年共同出版了《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一书,对分析折中主义的要义及其应用做了系统的论述。^④中国学者李少军在对国际体系进行解释时,提出过一种对不同理论进行综合运用的综合解释模式,^⑤与分析折中主义具有某种相似之处。

分析折中主义范式兴起的背景是国际关系学科中各范式之间的过度分割以及理

① 关于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可参见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1-23页;胡宗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论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0期,第56-61页;焦兵:《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超越对立,走向综合》,载《国际论坛》,2008年9月,第30-36页;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② Rudra Sil, "The Foundations of Eclecticism: The Epistemological Status of Agency, Culture, and Structure in Social Theor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July 2000, pp. 353-387.

③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 "Japan, Asian-Pacific Security, 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2001/2002, pp. 153-185.

④ 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著,秦亚青、季玲译:《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9页。

⑤ 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22-29页。

论分析过于追求简约,从而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基于此,分析折中主义一方面承认各范式均存在合理的成分,另一方面坚决反对某种范式具有先天或独占的优越性,而是主张“有选择地引入不同范式”。^① 它所研究的是,“基于不同研究范式发展起来的各种理论中所包含的不同机制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在某种条件下,它们又是怎样相互作用,以致影响到学者和实践者所关心的事情的发展结果”。^② 所以,分析折中主义的路径是综合式的,风格是实用主义的。它一般致力于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范式之间进行折中,但“也可以超出国际关系领域的更一般性的层次上进行重构。比如,折中主义可以采取沟通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两种分析框架的形式……简言之,折中主义是一个一般性战略,用以提出复杂的问题导向理论,打破人为分割的学术研究集团,并创造性地吸取它们各自的长处。当然,分析折中主义研究战略的具体轮廓则有赖于相对的知识环境”。^③

所以,折中主义并不寻求也不可能有一个简洁的分析模式或指南。要把它与范式导向研究区分开来,主要在于把握其三个标志性特征:第一,提出问题的开放性与强调问题的复杂性。与范式导向研究的概念简化趋势相反,折中主义甚至倡导一种“重新复杂化”。第二,强调不同因素的互动与综合,而不拘泥于既有的范式。^④ 相应地,折中主义提出的是介于普遍性理论与特殊性叙事之间的中观理论,不受元理论的束缚。第三,致力于真实社会的“实际对接”。分析折中主义认为,“大部分范式导向研究意在与现有的理论世界相对接,目的或是在偏爱的范式框架中进一步发展理论,或是反驳在不同范式框架中构建起来的理论,结果进一步扩大了理论和政策之间的鸿沟”。^⑤ 分析折中主义希望能够对真实世界的政策和实践问题做出新的解释,成为所谓的“公共社会科学”。

由于分析折中主义的这些特征,使得它较单一范式更适合对东北亚地区碎片化这一复杂事实进行分析。朱锋曾以赞许的态度论及“范式的折中主义与未来东亚安全研究”,^⑥但他只是提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并未通过具体的研究加以落实。前述希尔和卡赞斯坦等人有关分析折中主义的成果中,也未涉及东北亚的碎片化问题。因此,本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 “Japan, Asian-Pacific Security, 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p. 154.

② 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第9页。

③ 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第32-33页。

④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 “Japan, Asian-Pacific Security, 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p. 167.

⑤ 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第191页。

⑥ 朱锋:《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154页。

表 1 分析折中主义的标志性特征

- | |
|--|
| • 提出的研究问题具有反映现象复杂性的开放特征,而不是以改进范式研究或是填补范式研究空白为目的。 |
| • 构建的中观因果理论包含来自不同范式的多种机制和多种逻辑之间复杂的互动内容。 |
| • 完成的研究成果和提出的理论观点,既切实联系学术界的论争,也密切关注决策者/实践者的现实难题。 |

资料来源: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第17页。

文的意义不在于对分析折中主义做出某种评判,而在于将这一研究路径拓展到更多的具体议题领域之中。为了贯彻分析折中主义路径,本文依据这一研究路径的特征,主要强调如下几点:第一,如前所述,提出了地区碎片化的问题,这一问题是根据当前东北亚的现实提出来的,而非源于特定范式的概念或是推论,意在揭示东北亚地区的复杂现实,而非将其简单化。第二,从利益与观念两方面,亦即综合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范式对东北亚地区碎片化的生成进行综合考察。根据分析折中主义,这两种视角应该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并独自垄断对国际政治的解释。第三,基于上述考察结果,以改造现实世界为目的,对如何进行碎片化治理提出一些初步设想。这不但是对前面折中主义分析的延伸,亦符合分析折中主义致力于服务现实世界的根本要求。

二 利益导致的碎片化

对一个国家来说,核心利益不外乎三种:权力、安全与经济利益。在理性主义的理论光谱中,经典现实主义强调权力,^①新现实主义强调安全,^②而新自由主义则更加强调国家行为背后的经济现实与考虑(特别是相互依存论^③与贸易和平论^④)。这三个方面的利益拉力或张力,成为东北亚碎片化的重要成因。

(一) 权力竞争

权力竞争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中日之间的地区性权力竞争。无论是在

① 参见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参见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③ 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 Patrick J. McDonald, "Peace through Trade or Free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4, 2004, pp. 547-572.

东北亚还是在整个东亚,中日都是两个实力最强的国家,而且自近代以来几乎一直在竞争地区领导权。目前,中日正处在不相上下的阶段,中国拥有经济上的数量优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于2010年超过日本)与政治优势(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日本则仍然受到和平宪法的限制),而日本拥有经济上的质量优势。这种权力竞争的逻辑后果就是导致中日间的对抗关系,特别是日本,寻求以结盟增加对抗中国的力量。在以前,大国可以通过吞并小国来增长对抗另一个大国的实力,但目前已缺乏这样做的环境与条件。大国要增加自己力量、对抗敌手的办法之一,就是尽可能地缔结同盟。日本不仅牢牢把握住日美同盟,还尽力发展与东盟的关系,^①其中就有明显牵制中国的意图。

第二,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权力竞争。中美权力竞争带有全球的性质,即美国为当前全球唯一霸权国,并视中国为最有可能挑战其全球霸权的国家。这种情况在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更加明显,通过战略东移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战略重心开始从原来的中东转移到亚太特别是东亚。东北亚成为美国平衡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地区,而其双边盟友尤其是日本成为其牵制中国最主要的棋子。可以说,东北亚的地区合作对美国是不利的,所以它对该地区的地区主义发展持谨慎小心的态度,唯恐在东北亚各国之间形成一个排他性的框架。^②基于此,美国一直乐见中日间维持适度竞争的态势,双方在牵制中国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在东北亚形成美日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态势。

(二) 安全议题

在东北亚,具体的安全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二战遗留问题,主要是日朝间问题。日本长期侵占朝鲜,二战结束后朝鲜解放,但不幸的是,由于美苏的分割占领,朝鲜半岛被一分为二。冷战期间,日韩之间通过于1965年签订《日韩基本条约》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朝鲜并不承认这一条约,而日本也仅认同韩国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冷战结束后,日本承认了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现实,双方也一度就邦交正常化展开谈判。但由于朝核危机的发生,加上双方在“绑架”日本人事件、清算历史等问题上分歧严重,朝日迄今仍未实现关系正常化。

^① 当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遍访东盟各国,并且于2013年12月13-15日与东盟国家首脑举行特别峰会,会上除宣布向越南提供总计约9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6.5亿元)的贷款以促进越南基础设施建设外,日本还表示将向缅甸、老挝分别提供总额约630亿日元和104亿日元的贷款。参见新华网:《安倍拉东盟谴责中国遭遇失败 大把撒钱成效甚微》,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2/16/c_125864090.htm, 登录时间:2013年12月19日。

^② Gilbert Rozma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and U.S. Strategy in Northeast Asia," *Asian Survey*, Vol. 47, No. 4, 2007, p. 619.

第二,朝鲜战争遗留问题。由于朝鲜战争结束后仅仅签署停战协定而没有签署和平条约,美朝、韩朝均处于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中国原来是朝鲜战争的重要一方,先后通过与美国、韩国的关系正常化,已解除了彼此间的敌对关系。目前,朝鲜与美、韩之间虽然没有发生重大战争,但一直断续有零星冲突,最近的一次是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只要半岛上的战争状态没有通过条约正式解除,首都处于朝鲜火炮射程范围内的韩国以及处于美国绝对优势军力威胁下的朝鲜,都不会感到安全。下面所提到的朝核问题之所以会发生,其重要根源之一就在于朝鲜的极度不安全感。

第三,朝核问题。此项问题涉及两项重大利益:一是无核化。针对这一议题,朝鲜一方坚定地试图发展核武器,而中、美、韩、日(还有本文未加分析的俄国^①)则都坚决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在反对朝鲜拥核的问题上,呈现出五对一的态势。^②二是朝鲜的生存稳定。在此问题上,中国与朝鲜拥有共同利益。中国在反对朝鲜拥核的同时也反对美韩试图推翻朝鲜政权的行爲。在半岛问题上,中国始终有一条“红线”,就是绝不允许生战生乱。^③美国、韩国则恰恰相反,前者出于对朝鲜的敌视,后者出于潜在的统一考虑,都不愿意看到朝鲜政权的持续稳定与强大。当然,这种对抗在多半时候是潜在的,美国与韩国出于诱使朝鲜妥协的目的,也在一定情况下对朝鲜提供经济合作和援助。特别是韩国朴槿惠总统提出半岛信任进程以后,经常释放出对朝友善的信号。但从根本上看,韩国试图统一半岛、美国从安全上敌视朝鲜的想法不会变,^④这也就决定了两国在朝鲜政权的稳定与未来走向上有着根本不同于中朝的看法。

第四,领土主权争端。主权争端常常是造成国家间安全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东北亚,民族主义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对主权的看重与坚持,是当前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目前东北亚的领土主权争端主要包括三点:一是钓鱼岛问题,形

① 本文所分析的东北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美国。美国虽然在地理上不是东北亚国家,但在此地区有着根深蒂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存在,对东北亚的局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已成为东北亚国际结构中的一部分。而俄罗斯自从苏联解体后,对东北亚的介入迅速减少,不足以像美国那样对东北亚的国际结构与国际走势造成重大影响,故未列入分析范围。

② Gilbert Rozma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and U.S. Strategy in Northeast Asia," *Asian Survey*, Vol. 47, No. 4, 2007, p. 607.

③ 王毅:《朝鲜半岛就在中国家门口 绝不允许生战生乱》,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3-08/5926818.shtml>, 登录时间:2014年3月8日。

④ 最新的例子是:当朝鲜发生张成泽事件后,韩国加快了统一准备进程,拟成立直属总统的统一准备委员会(参见《韩青瓦台:总统直属统一准备委员会正在筹备中》,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3/4898908.html>, 登录时间:2014年3月12日);美国国防部则在一份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视朝鲜为“关键的”安全威胁(参见 Cheryl Pellerin, "DOD Report: North Korea Still Critical U.S. Security Threat,"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19924>, 登录时间:2014年3月12日)。

成了中日对立。特别是自2012年日本对该岛进行所谓的“国有化”,中日关系恶化至今未有好转。二是独岛(日本称竹岛)问题上,形成了日韩对立。目前该岛实际由韩国控制,但日本方面誓不放弃,并设立了“竹岛日”,双方在此问题上摩擦不断。三是在苏岩礁问题上,形成了中韩对立。

(三) 经济合作

经济议题不同于权力、安全议题,常常以合作、互赢为特征。当然,由于贸易摩擦、投资限制等原因,相关国家间也会有争议。但从近些年的情况看,东北亚各国之间并未出现重大贸易争议。相反,中日韩三国间不仅贸易发展迅速,在财金、环保、农业等领域上的合作也在快速推进。^①目前的主要矛盾来自于中日韩自贸区(FTA)与日韩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之间的矛盾。中日韩自贸区旨在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通过为商品与服务部门开放市场,促进三国之间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流动。^②相对于中日韩自贸区而言,TPP的特征是高标准、宽领域、高水平的贸易投资开放。它目前已成为美国所主导的更高水平的经济合作形式,致力于邀请日本和韩国参加。美国名义上不排斥中国,但该组织本身就有牵制中国、夺回美国在亚太经济方面主导权的意图,所以美国至少是目前并不希望中国参加。而中国由于自身的经济开放水平,也缺乏参加的足够动力。这就导致一种既有竞争又有交叉合作的复杂关系。

这种复杂性在“脚踏两只船”的日本与韩国那里体现得尤其明显。对日韩两国来说,与中国缔结自由贸易协议较它们彼此间缔结自由贸易协议而言,能够得到更大的收益,“从经济上看,中国是日本合乎逻辑的自由贸易伙伴”。^③但在TPP问题上,日韩也有相当的兴趣。例如,韩国当前体现出同时推进TPP与韩中自贸区的意图。有媒体判断,韩国政府在就加入TPP展开预备性双边协商的同时,计划考虑中国的立场,同时加速韩中自贸区谈判,继续巩固与中国间的关系。^④而日本一方面担心中韩率先建成自贸区,另一方面又想参加TPP。这些都表明,中日韩自贸区与TPP两个合作体系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相互之间没有根本冲突,两者间是一个交叉、重叠与部分竞争的关系。

① 江瑞平:《中日韩经济合作:动因、态势与影响》,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30-41页。

② Sarah Chan and Chun-Chien Kuo, “Trilateral Trade Relations among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45.

③ Joel Rathus, *Japan, China and Networked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80.

④ 崔垞豪、郑园焯:《韩政府表明关注TPP谈判,同时加速推动韩中FTA谈判》,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 http://cn.joins.com/gb/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12433, 登录时间:2013年11月30日。

表 2 利益导致的碎片化

利益动机		行为结果	
权力冲突		中 vs 美日	
安全	二战遗留问题	朝 vs 日	
	朝鲜战争遗留问题	朝 vs 美韩	
	朝核议题	无核化	朝 vs 中美日韩
		朝鲜稳定	中朝 vs 美日韩
	领土争端	钓鱼岛	中 vs 日
		独岛(竹岛)	日 vs 韩
苏岩礁		中 vs 韩	
经济	地区自贸区与 TPP	中日韩 X 美日韩	

注:vs 表示排斥性的竞争关系,X 表示交叉性部分竞争的关系。

三 观念导致的碎片化

根据建构主义,共有观念是一个构成因素,将塑造行为体利益并进而决定行为。^① 观念的范畴很广,它可能是共同知识、规范、规则或是政治文化。^② 在本文中,共享观念不是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所乐于强调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等共有文化——它们塑造了行为体的一般性政治行为(如彼此为战或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而是指联结某些东北亚国家的具体观念纽带,如共享的传统文化、历史记忆与价值观念等。这里的观念也不是个体层面的,而是集体层面的观念。对于个体所持信念如何影响外交政策,朱迪斯·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等人进行了精辟的阐释。^③ 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不同群体之间类似或相同观念所导致的彼此间亲近与合作的作用。一般而言,具有相近或类似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群体间更容易产生亲近感,更容易实现合作,而有关历史上敌对的记忆则一般会妨碍合作。在东北亚,不同的观念产生了不同的行为动力,从而影响到相关

① 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2008年版。

② 宋伟:《国家认同与共有观念——对社会建构主义核心概念的反思》,载《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第110页。

③ 两人所分析的个体层面的信念包括世界观、原则化的信念和因果信念,它们通过提供原则化的或因果性路线图、在不存在单一均衡的地方影响战略、嵌入制度等因果路径影响外交政策。参见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主编,刘东国、于军译:《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一) 文化传统

佛教与儒家文化是东北亚国家共享的文化传统。^① 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在文化上与上述各国的关系要更远一些。当然,由于东北亚各国历史上受佛教、儒家文化影响有差异,现实中的体现更是不同,所以彼此间的亲近感也不尽相同。例如,在历史上,朝韩与中国在文化上更加接近,而日本则相对独立,受中华文化影响稍次。从现实来看,韩国、日本保存传统文化较多,朝鲜则由于其政权的性质,几乎排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近年来开始倡导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复兴。所以,整体而言,基于文化观念的分析,应该是中韩日之间有着更大的合作动力,它们与美国之间的合作动力则稍次。这点在中美韩关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韩国与中国之间的历史与文化联系,一些韩国官员甚至视依赖中国为长期依赖美国的替代选择。^② 韩国外交通商部2012年年底在向总统交接委员会提交“就夯实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相关方案”中,曾探讨使用“人文同盟”这一概念,后被朴槿惠政府更名为“人文纽带”。^③ 用词虽然变化了,但文化在促进中韩合作方面的作用显露无遗。

当然,在特定情况下,共同的文化根源也可能有抑制合作的一面。例如,2005年11月2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韩国端午祭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中国人认为韩国人“偷”了中国的端午节。这就是所谓“文化所有权上的冲击”。^④ 中韩在地缘、文化上更为临近,相应的冲突也更为突出。另外,在思考韩国文化时,也要看到基督教对其的影响。这是韩国不同于中国的地方。“比较东方三国(中、日、韩),基督教传入韩国比其他两国较晚,但韩国在接受基督教方面却非常积极。”^⑤ 据统计,基督徒已经占韩国总人口4900万的26.3%,其中包括19.7%的新教徒和6.6%的天主教徒。在首尔,基督徒约占总人口的1/2。^⑥ 这种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它与美国的文化距离,部分地抵消了

① Ginal L. Barnes, *China, Korea and Japa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East Asia*,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3, p. 7.

② Michael H. Armacost, “The Future of America’s Alliances in Northeast Asia,” in Michael H. Armacost and Daniel I. Okimoto, eds., *The Future of America’s Alliances in Northeast Asia*, Stanford: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Publications, 2004, p. 21.

③ 《韩国总统朴槿惠对华政策和外交的六大基石》,2013年6月27日, <http://news.cntv.cn/2013/06/27/ARTI1372314917240859.shtml>, 登录时间:2014年2月28日。

④ 张慧:《东北亚文化合作能够走多远——由东北亚合作中的文化因素说起》,载《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42页。

⑤ 金英:《韩国基督教对韩国现代化之价值观形成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1期,第144页。

⑥ 满岩:《基督教对韩国各社会领域的影响》,载《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18页。

它与中国文化类似性而形成的亲近感。

(二) 历史记忆

目前,东北亚国家所涉及的历史记忆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古代历史,主要是指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该体系历经上千年,对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时,很多周边国家是出于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与敬畏而主动加入和要求维系这一体系的,并甘居藩属地位。但随着主张民族国家平等的近代国际体系的引入,周边国家开始以一种反思的心态看待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并随时警惕朝贡体系思维在中国的复活,担心中国重新把周边纳入一个不平等的现代朝贡体系范畴。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朝鲜,即使它对中国十分依赖,但仍然极力倡导主体思想,对历史上曾坚持的“事大主义”十分警惕。

另一部分是近代历史。在朝贡体系崩溃过程中以及之后,日本扮演了一个地区侵略者的角色,并通过甲午战争、吞并朝鲜、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事变,给相关国家与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创伤。特别是日军在战争期间的野蛮行为,如强征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更是给中国人民和韩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这种记忆不可能被抹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关国家的行为。正是源于这种近代历史记忆,中韩朝三国都对日本心存不满。安倍晋三2013年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后,三国都展开了激烈的批判。相对而言,美国虽然也在珍珠港受到了日本的偷袭,但毕竟本土没有遭受日本的侵略,反而后来打败并占领了日本,所以对日本少有关于仇恨的历史记忆。但毕竟二战是一场美胜日败的战争,美国不会允许日本无限制地在历史问题上翻案。正因如此,美国也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表达了“失望”情绪。^①

(三) 意识形态

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最为突出。当前有所淡化,但不可能完全消失。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来说,由于深受道德优越感的驱动,在国际关系中推行民主、自由已成为其重要的外交使命,根据意识形态界定敌友成为美国重要的外交标准。许多东亚研究者也注意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与美国共享民主理念的国家应该是美国的天然盟友;换言之,共同价值通常有助于维持联盟”。^② 根据这一意识形态逻辑,美国与具有类似政治制度的日本、韩国之间应该有

^① 《美国务院: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失望》,2013年12月27日, 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anbeijingguo/content-3/detail_2013_12/27/32517501_0.shtml, 登录时间:2013年12月28日。

^② Russell Ong, *China'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143.

着更为紧密的关系,而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则相对较远,且处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地位。类似地,意识形态差异也会成为中日、中韩合作的一个负面影响。

事实确实如此。韩国与美国在政治制度与价值观上的类似性有助于加强两国的军事同盟。^①李明博执政时期,将价值同盟列为新世纪韩美战略同盟的三大原则之首。^②“而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也使得日本领导人更难理解中国的内外政策,更加谈不上对日本人民进行解释了。”^③特别是在当前的日本政府那里,意识形态成了一个重要的观察棱镜。安倍首相提出了价值观外交,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新支柱。该概念和“自由与繁荣之弧”一起,旨在把亚洲的民主国家联系起来,布下一个包围被认为是非民主国家的中国的广泛网络。^④所以,存在着美日韩在意识形态上的国家合作区块与中朝区块之间的竞争。

表3 观念导致的碎片化

观念动机		行为结果
传统文化		中韩日 vs 美
历史记忆	古代朝贡体系	中 vs 朝韩日
	近代日本侵略	中韩朝(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美国) vs 日
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中朝 vs 美日韩

注:vs表示排斥性的竞争关系。

四 利益、观念与碎片化治理

上述分析表明,东北亚地区正陷入由利益、观念两类因素所导致的多重碎片化境地。根据分析折中主义,不但要指出利益和观念两类因素在分别生成碎片化方面的作用,还要关注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与影响。^⑤为了便于探讨这种联系,笔者将不同国家合作区块之间的利益或观念冲突分解到以国家为单位的双边关系之中。这

① Russell Ong, *China'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 112.

② 《李明博提21世纪韩美同盟三原则 实用外交第一步》,2008年4月18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04/18/content_14973722.htm,登录时间:2014年2月28日。

③ Joel Rathus, *Japan, China and Networked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p. 24.

④ Joel Rathus, *Japan, China and Networked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p. 58.

⑤ 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第2,9页。

是因为,较国家合作区块之间的双边关系而言,我们更容易对国家间的双边关系状况做出判断,从而有利于通过这种关系的性质来判断其中的利益与观念之间的关系。另外,在列出冲突因素的同时,笔者还根据前面两节的分析列出双边关系中的合作因素,以从冲突因素与合作因素的直观比较中判断利益与观念因素的作用与关系。

根据当前的现实,东北亚各国间的双边关系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类:一是同盟关系,如日美、韩美关系(有正式的同盟条约,有定期的联合军演、政治安全磋商等)。二是非同盟但存在经常合作的关系:中朝(有形式上的同盟条约,但无相应的实质内容;存在一定的政治互动与较紧密的经济合作,但缺少密切的社会、文化与人员往来)、中韩(有一定的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合作,但无相应的制度化关系)。三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韩日(通过美国形成的间接同盟,但彼此关系并不和睦)、中美(战略上、潜在的竞争与公开的具体议题合作并存)、中日(长时期陷入政冷经热甚至政冷经也冷的状况^①)。四是敌对关系:美朝、韩朝、朝日(朝鲜与这些国家或仍处于法律上的战争状态,或仍未实现关系正常化)。

以上双边关系的状态以及相应的利益与观念因素如表4所示。

根据表4,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尽管无法描述出明确的线性关联,但可以看出冲突或合作因素的多少与关系程度的好坏具有明显的关系。同盟关系中合作因素多、冲突因素少,而敌对关系中合作因素少、冲突因素多。第二,造成国家间冲突的,往往既有利益因素,也有观念因素,“观念与利益一样,都具有解释人类行为成因的分量”。^②现实世界不是理性主义所说的那样物质化的,也不是建构主义那样观念化的,而是两者的综合。第三,利益因素与观念因素常常纠缠在一起发生作用,很难判断究竟是哪种因素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双边关系比较复杂,不好判断其中利益、观念因素的大小。但即使是如同盟、敌对这样性质比较单一的双边关系,在合作、冲突因素中,也都是物质、观念因素混杂,很难表明哪类因素起了主要作用。第四,利益与观念的互动表现在信号的相互反馈与加强。特别是在冲突因素之间,似乎更容易发生这种效用。

^① 这点在2012年9月新一轮钓鱼岛争端出现以来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的前7个月,中日贸易总额1740亿美元,同比下降8.8%。在对美欧双边贸易普遍增长的情况下,日本成为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唯一贸易总额同比下降的国家。参见杨汀:《中日商界互访欲破“政冷经冷”》,2013年10月30日, <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3/1030/293796.shtml>, 登录时间:2013年12月19日。

^② 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分析框架》,载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主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第3页。

表4 利益、观念因素的关系及其结果

双边关系	关系状态	冲突因素		合作因素	
		利益	观念	利益	观念
韩美	同盟关系		传统文化差异	朝鲜的稳定与无核化	意识形态
日美			传统文化差异	朝鲜的稳定与无核化、与中国的权力冲突	意识形态
中韩	非同盟,经常合作	领土争端、朝鲜稳定	意识形态差异、对中国朝贡体系的记忆	朝鲜无核化	对日历史记忆、共同传统文化
中朝		无核化	对中国朝贡体系的记忆	朝鲜稳定	对日历史记忆
韩日	竞争与合作并存	领土争端	近代日本侵略	朝鲜的稳定与无核化	意识形态、传统文化
中美		中美权力冲突、朝鲜稳定	传统文化差异	朝鲜无核化	
中日		中日权力冲突、领土争端、朝鲜稳定	意识形态、中对日的历史记忆、日对朝贡体系的记忆	朝鲜无核化	传统文化
朝韩	敌对关系	朝鲜战争遗留问题、朝鲜稳定、无核化	意识形态		对日、对朝贡体系的历史记忆
朝日		二战遗留问题、无核化	对日历史记忆		对朝贡体系的历史记忆
朝美		朝鲜战争遗留问题、无核化	意识形态、文化差异		

注:由于中日韩自贸区与 TPP 是一种交叉性部分竞争关系,无法简单列入冲突或合作因素,因此在本表中被排除。

上述结论可归结为一点:利益与观念因素的相互反馈强化了东北亚地区的碎片化,但很难区分何者起了更大的作用。从范式导向研究的角度看,这样的结论可能过于含糊,因为它们认为理清利益与观念因素到底谁发挥了主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且构成了理论分野的关键标志。但是,分析折中主义作为一种中观理论,主

要致力于“追踪和比较可类比情境中相关机制不同的排列与组合”，“强调开放地探讨更广泛领域里的各种因果要素”，而非提出某种简化的元理论。^① 这种路径可能更加接近现实。现实世界构成了一个系统，国家行为作为一种系统输出，很难检验到底是何种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系统常常表现出非线性的关系 (nonlinear relationships)，系统运行的结果不是各个单元及其相互关系的简单相加，许多行为的结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② 特别是在不考虑特定范式标准的情况下，既无法也不应确定各类因素的影响权重。在东北亚，你可以找到观念重于物质利益的例子，例如，中韩之所以排斥日本，主要是因为历史问题。^③ 但相反的例子也常常存在，如美日跨越文化差异的紧密合作。

因此，在政策世界中，笼统地强调利益与观念何者更为重要并无多少意义，反而可能有背离复杂现实的嫌疑。关键是根据具体情况，找出应对这些问题的办法。因此，根据分析折中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必就利益还是观念因素更加重要做出判断，而应该根据碎片化的成因与表现，就碎片化治理做出针对性的分析。碎片化的反面是整体化或一体化，对一个地区来说，碎片化治理的根本办法就是整体性治理。所谓整体性治理，其要义就在于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④ 也就是说，从碎片化走向整体化或一体化。碎片化与整体化的区别体现在：在主体上，在碎片化的地区中，国家或国家合作区块拥有高居于整个地区之上的地位，在整体化的地区中则被包融于整体地区之中。在关系性质上，碎片化地区中的国家或国家合作区块间的竞争或冲突关系十分突出，在整体化的地区中则受到抑制。根据这一比较，整体性治理的目标与方向包括三点：第一，在主体上，从强化的国家或国家合作区块走向弱化的国家或国家合作区块。第二，在关系性质上，国家或国家合作区块之间的竞争或冲突关系从强化走向弱化。第三，实现最终目标，即地区合作从弱化走向强化（参见图1）。根据这一整体性治理模式，东北亚地区的碎片化治理关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极力避免出现割裂地区的各种次地区合作区块，特别是同盟集团。对已经形成的次地区合作区块，则需要尽可能地淡化其与外部的“自我-他者”边界，以开放

① 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第188页。

② 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等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页。

③ 《美调查称中韩八成民众厌恶日本 安倍称未被孤立》，http://news.ifeng.com/mil/1/detail_2013_07/14/27485409_0.shtml，登录时间：2014年2月16日。

④ 曾凡军：《论整体性治理的深层内核与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之道》，载《学术论坛》，2010年第10期，第3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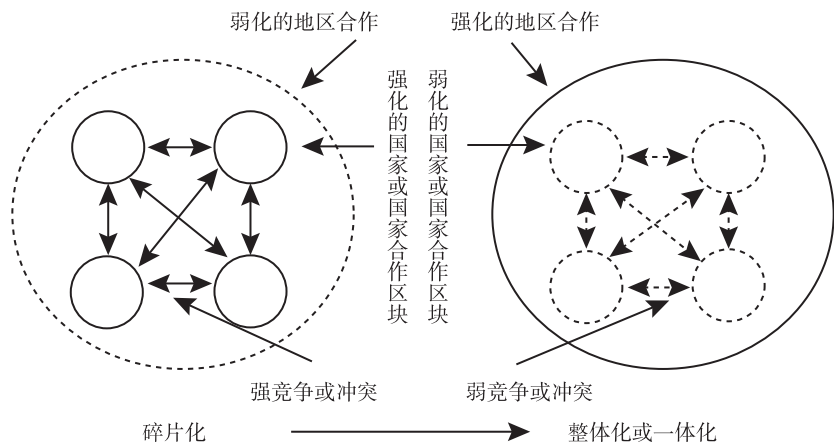


图1 碎片化治理示意图

式的合作逐渐融入到整个地区的合作之中。例如,对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应该逐步向其他国家开放,与其他的国家合作形式融合,变成整体地区安全合作框架的一部分。

第二,缓解各国或国家合作区块之间的紧张关系,具体途径就是管制利益与观念冲突,培植并扩大共同利益与观念。从利益层面看,需要缓解的利益冲突主要是减少在中国与美日权力竞争、朝核议题、朝鲜战争与二战遗留等议题上所形成的对立状况,需要扩大的共同利益则包括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从观念的层面看,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大力恢复并强化东北亚各国间的共同文化纽带,淡化意识形态因素,同时管理好历史记忆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当前,朝核问题所导致的朝鲜与其他国家的对立、日本历史观引发的与邻国关系紧张以及中日间的领土争端等,都是特别突出甚至紧急的利益与观念冲突议题,尤其需要探讨现实的管控方式。不能让这些冲突因素压倒合作因素的成长,而应该以合作因素带动冲突因素的解决。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巩固合作成果,通过领导人的理性选择等方式避免冲突因素的扩大,最大程度地避免不同国家或国家合作区块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三,推动地区层次的合作,将各种国家或国家合作区块包容其中,以达到从根本上缓解并最终消灭碎片化的目的。自2008年起,中日韩领导人开始在东盟峰会框架之外单独举行峰会,探索一种东北亚地区合作的新模式。但由于中日钓鱼岛争端,2013年会议流产。自安倍晋三于2013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以来,日本与中、韩关系均出现严重恶化,三国峰会2014年能否举行也尚未可知。由于尚处萌芽中的地区合

作机制中断,不但政治、安全领域的东北亚地区合作无从谈起,经贸领域的自贸区谈判也因为 TPP 而出现一定的变数。这使得本已薄弱的地区合作进一步弱化,是当前碎片化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对此,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应该从本国长远利益以及地区的整体利益出发,把地区合作提升到战略高度,创造恢复对话与接触的时机与条件。如无此认识与相关努力,碎片化的最终化解就难有实现可能。

五 结论

东北亚作为经济上最活跃、战略上越来越重要的地区,^①在地区合作方面出现严重的碎片化状况是不正常的,必须及早予以缓解和治理。分析折中主义路径有利于全面地呈现利益和观念因素所分别导致的碎片化,深入地了解这种碎片化在形成与治理过程中的复杂性。特别重要的是,分析折中主义路径指引我们抛开范式上的对立与理论上的争论,不拘泥于利益与观念何者更加重要这一议题,以还原复杂、贴近现实的态度就东北亚地区的碎片化状况做出现实的评估,对其治理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简单来说,如果要纠正这种碎片化,就必须追根溯源,消除或缓解其中的冲突因素,增加和培育其中的合作因素,以达到缓解各国或国家合作区块之间紧张关系的目的。另外,以整体性治理的方式构建全地区合作区块,将各种国家或国家合作区块包容其中,才能达到从根本上缓解并最终消灭碎片化的目的。当然,由于利益与观念问题众多、盘根错节,决定了东北亚地区的碎片化治理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需要各方在及早推进治理的同时,对东北亚碎片化治理有足够的耐心与持久的意志。不管如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必须理性地看到,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合作正在推进的背景下,如果不及早采取措施消除至少是缓解东北亚合作的碎片化状况,这个地区未来将蒙上一层阴影。

(截稿:2014年2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Joel Rathus, *Japan, China and Networked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p. 1.